

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历史底蕴和深厚内涵

丁晓强

〔摘 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取得政权后要成为人民公仆的基本要求，来自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执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干部行为的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和行为规范，其表现和影响随着全面执政、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日益凸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时代新征程，要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系统阐述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绩观的思想与实践的深刻总结，具有深厚内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绩；政绩观；党员干部；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26）05-0087-12

〔作者简介〕丁晓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10.16580/j.sxlljydk.2026.05.015

政绩指的是执政主体及其骨干，在执政事务中所取得的成绩。政绩观则是关于政绩的总体认识和根本观点，直接反映了执政主体及其骨干的价值取向，是指导他们履职尽责、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奋斗锤炼而成的对于干事创业的政治品格。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把握共产党人的政绩观，能更好地理解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时代特征和深厚内涵。

一、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历史底蕴

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要求，是在革命实践中凝聚的价值取向，是党的组织路线特别是干部路线核心内容，是党的作风建设本质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不提出任何有别于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原则”，^{[1]44}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因此，要求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方面应该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应该是“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44}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或者说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就是要防止旧的国家政权的“政治家们”在国民中构成“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成为社会的“主人”，^{[2]110}并提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就是要从社会主人再转变为社会公仆，“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

承担责任的勤务员”。^{[2]156}

1.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阐述确立了干部行为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正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探索真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国情和在中国开展革命的现实需要，使中国共产党人凝聚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工人人数较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同盟军，因此中国革命需要广泛的人民大众的力量支持；由于中国革命是以革命的军队形式进行的武装革命，党曾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这就有了一个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而这个关系突出地表现为在一定执政条件下的干群关系和军民关系。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如何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日常性的基本问题。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斗争，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成为特别突出的问题。毛泽东十分注意革命军队的群众纪律，1927年10月，他向秋收起义的军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其中包括“不拿群众一个红薯”，^[3]后来又加上了“八项注意”。“八项注意”明确军队与群众交往中的注意事项，还规定了革命军队的三项任务，其中包括做群众工作。但这一时期党中央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就是盲目地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强迫群众不顾条件地进行武装暴动，使党严重地脱离群众。1928年7月，党的六大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争取群众”^{[4]390}的总路线，而且具体指出了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与争取群众的任务是不能并存”^{[4]392}的。毛泽东积极宣传这一精神，1929

年3月，他在兴国干部会上说：“每个共产党员应加强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念叨着‘争取群众’。”^[5]随着土地革命的展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区政权的建设中亦十分重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6]要用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善群众生活。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7]138}特别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7]140}由此形成了苏区干部深入群众、为群众解忧解困的形象。

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就是延安作风，提出要用“延安作风”打败官僚习气的“西安作风”。^[8]1940年2月，毛泽东曾用“十个没有”来描述陕甘宁的状况，其中第一个就是“没有贪官污吏”。^{[9]718}1942年12月，毛泽东表扬了延安县党员干部们的精神，对群众负责，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积极服务于群众的生产生活，^[10]延安呈现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新气象。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并在1944年以后进行了系统阐述。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1]1004}“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2]243}“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3]1128}“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

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1095-1096}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全心全意为中国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精神，^[14]此后，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党的宗旨基本表述，回答了党员干部为什么干的问题。

2. 正确组织路线的确立明确了干部行为的目标导向

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遵义会议以来，党在纠正了党内“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摈弃了排除异己、任人唯亲的错误组织路线，逐渐形成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

1937年5月，毛泽东在讨论干部问题时提出，干部需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7]277}1937年10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时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15]34}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的“任人唯贤”的路线。^{[9]527}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明确了党员干部应该怎么干的问题。

任人唯贤的“贤”，是德才兼备。从上述

论述中可以看到，才包括政治远见、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德包括信仰、精神状态、党性修养和工作态度等方面。德和才最终都要落到务实的工作态度上，而且务实贯穿于德与才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7]277}而是要“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15]34}从才的方面看，主观主义者就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11]800}脱离实际，不愿或不能进行调查研究，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德的方面看，不实，则体现为没有处理好个人和组织、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专门提出讲真话的问题，要求“不偷、不装、不吹”。^{[12]349}偷，就是抄袭，把别人的东西当自己的，不诚实；装，就是不懂装懂，装腔作势吓唬人；吹，就是吹牛，不报实数、夸大成绩。在为《七大纪念册》题词时，毛泽东写下“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此后，忠诚与老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党考察党员干部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标准。邓小平指出，选干部“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16]75}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17]226}

3. 三大作风的形成构建了干部行为的基本规范

党的作风是通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的行为来体现的，是党员干部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或行为风格，反映了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和素质修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特别重视作风建设，既重视群众工作中的工作作风建设，也重视党

领导工作中的思想作风建设。1930年毛泽东撰写《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4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阐述了服务群众的根本性意义。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了延安整风，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经过延安整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认为，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11]1094-1096}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党的学风和核心思想作风，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正确了，党的政治路线才能正确。同时，党要求党员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工作中，要克服主观主义，既不能生搬硬套本本和上级指示，又不能仅凭个人主观想象，更不能自以为是、装腔作势、颐指气使。毛泽东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讽刺主观主义者脱离实际、华而不实的形象，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11]800} 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深入研究，分析其中的内部联系，把握规律性，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特别需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去，进行细致的甚至是艰苦的调查研究。这是党员干部要干好工作必须遵循的认识论基础，必须具有的首要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关系到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1943年6月，毛泽东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

若干问题》，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1]899}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的基本表述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前两句是根本观点，后几句是工作路线。党员干部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必须要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不仅要反对主观主义，而且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要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一要树立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11]1094-1095}的根本观点；二要在工作中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有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谦虚态度和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理念，“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11]899} 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作风在工作作风上的必然要求，是党员干部必须具有的最基本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在延安整风中得到总结和成熟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培育的主要方法，要求党员干部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11]1004} 能否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党性问题，毛泽东说，与无数

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了生命的先烈比起来，“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1]1097}是否承认自己有缺点，还是一个是否老实的问题，毛泽东说：“如果觉得自已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18]34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员干部行为的价值取向、行为导向、行为规范，奠定了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基本要素。

二、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时代特征

政绩及政绩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突显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全面执政，并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绩及政绩观成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干部政绩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出现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干部的政绩观也成为一个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需要什么样的政绩，应该确立怎样的政绩观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具有时代的特征。

1. 全面执政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革命的胜利，全面执政环境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挑战。毛泽东十分重视所面临的全面执政的考验，思考了怎样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1438-1439}“两个务必”，一是防止党员干部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是、心浮气躁、高高在上；一是防止党员干部在革命胜利后，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甚

至贪污腐化。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整党整风，多以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贪污浪费等为主题。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形成特殊的官僚利益阶层保持着高度警惕，对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保持着高度重视，要求党员干部要到生产一线参加劳动，保持与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后，我们党要求全体同志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取得新的成就。我们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不够，指导思想上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所警惕。1958年，他在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时，将原句“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调整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19]1961年1月，他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教训时：“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20]

在当时党内急于求成指导思想影响下，1958年以后，党员干部中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严重脱离实际、严重违背群众路线，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也反映了当时部分党员干部的错误政绩观，就在于一味迎合、急于求成。针对这样的状况，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强调调查研究，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以纠

正干部“五风”。1961年1月,毛泽东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向全党发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主要内容有:三大纪律为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为参加劳动,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特殊化,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21]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在工作中处理好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上级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2. 发展是硬道理要求干部有突出政绩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6]312}他实事求是地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提出了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问题又成了关键要素。而且,这个时期又正处于新老干部的交接期,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干部已处于中老年期,急需年轻干部快速成长,选什么样的干部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党在整顿处理“三种人”、解放大批老干部后,开始把选择年轻干部作为重大战略性任务。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6]396}的要求,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往开来的时代需求。

什么是革命化呢?核心就是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由于在这个时期,党既面临着右的干扰,也面

临着“左”的干扰,而主要是防止“左”,所以,关键是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要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问题,要赶上时代,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22]377}反对空谈所谓姓“社”姓“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23]151-152}由此,他又提出了干部政绩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89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22]300}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2]372}这也是干部创造政绩的根本价值导向。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高度革命事业心和为人民服务的强烈责任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干部,要委以重任。”^{[24]247}政绩突出、群众信任,就成为干部考核和选拔的关键依据。强调干部的政绩,体现了实践是检验干部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干部在实践中创造的政绩是干部德才素质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干部素质高低最终要在政绩中体现出来。这就要求“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腐观念”,“把那些在实践中政绩突出、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优秀分子不失时机大胆放在关键岗位上”。^[25]

1998年底,中共中央在全党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

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大力弘扬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纠正和防止追逐个人名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以及只图形式、不重实效等不良习气”。^[26]江泽民强调要发现和选拔那些“真正是政治坚定、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拥护，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脚踏实地干工作的干部”，而要严厉批评甚至查处那些“政治信仰动摇，工作不负责任，热衷于投机钻营、跑官要官、争权夺利、拉帮结伙，以及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人”。^{[27]503}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带头在全党反对搞形式主义，反对搞花架子，反对做表面文章，反对一切图虚名、搞虚夸、铺张奢靡、劳民伤财的坏作风，在全党全国大兴说老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优良之风”。^{[27]578-579}

怎么把握干部的政绩呢？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所以，政绩首先体现在各级领导干部抓经济发展的业绩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成为最重要的指标。各地进行GDP排名，并直接与干部的政绩考核相联系，这在当时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仅仅关注GDP又是不够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江泽民指出为教育办实事、精神文明建设、环保方面的工作，也要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24]371、381、535}他特别指出，民生问题是最重要的政绩，尖锐地批评了搞“政绩工程”的现象是闹笑话、干蠢事。^{[27]512}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后，江泽民在用词上多以“实绩”替代了“政绩”，表明他对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为政绩而政绩”甚至弄虚作假现象的警惕。

在新世纪之初，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要求各级党委“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建工作”。^{[28]15}江泽民说：“对领导干部的表现，党和人民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他们的工作实绩”，领导干部“决不能老是去琢磨自己怎样升官，怎样出人头地，怎样捞点好处”。^{[28]5}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不搞虚报浮夸的假政绩，不搞劳民伤财的达标升级活动，不搞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29]江泽民特别提出了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的要求，指出“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28]419}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否正确看待和行使权力，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长期的根本性课题”。^{[28]420}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8]422}

3. 科学发展要求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政绩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也日益显著。针对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2003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又于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这就要求在以发展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就要求干部的政绩“既要看到经济建设成果,又要看到社会进步成果;既要看到城市变化,又要看到农村发展;既要看到当前发展,又要看到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到经济增长总量,又要看到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又要看到党的建设成效”。^{[23]160}所以,要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正确政绩观。胡锦涛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30]628}

胡锦涛要求领导干部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其中为民和务实,是正确政绩观的基本体现。为民,就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务实,就是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胡锦涛指出:“树立正确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实践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不盲目攀比;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搞花架子;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23]121}他强调,“真正的政绩应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是为党和人民踏实工作的实绩,应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23]107}

胡锦涛指出了践行政绩观中不正确的表现,主要有为“追求所谓的‘政绩’、忽视百姓疾苦,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尊重规律,

乱上项目、乱铺摊子,做表面文章,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30]197}胡锦涛认为,“这些人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能正确对待名利地位”。^{[23]107}他指出:“秉持什么样的政绩观,是衡量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也是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体现。”^{[30]201}

胡锦涛提出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2004年1月,他在十六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他强调要把求真务实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去,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眼前和长远、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要激励干部求真务实,“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和惩戒”。^{[23]161}

新世纪新阶段,坚持科学发展突出了领导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树立与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了理论和实践准备。

三、新时代新征程共产党人政绩观的深厚内涵

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高度重视共产党人政绩观问题。早在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深入剖析了政绩观偏差在工作上的具体表现是“五重五

轻”：一是重始轻终，缺乏一种善作善成、有始有终的踏实作风；二是重短轻长，把追求近期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是“做事”而是“做秀”，不是“造福一方”，而是“造势一时”；三是重显轻隐，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四是重易轻难，抓工作拈轻怕重；五是重局部轻全局，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31]414-415}他认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党员干部的必备品质，并提出了“说真话就是水平，干实事就是能力”^{[31]542}的观点，把干在实处作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前提。他深刻地指出，正确政绩观指导我们正确地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要问题。^{[31]413-4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员怎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员关于政绩观的思想与实践的总结，突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

1. 政绩为谁而树

习近平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32]1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把政绩观问题提升到根本性问题的地位。这个根本性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十五五”规划能否贯彻执行、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等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没有特殊的利益，也提出了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能否成为社会公仆的问题；毛泽东等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中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革开放以

来，党面临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要求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将之提到了能否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32]28}党性是党所代表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毛泽东说过：“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12]340}党性是建立在党员的个性基础上的，是在党员干部的言行中体现的。党的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是他们的权力观和事业观的综合体现，最集中地反映了党性的强弱程度，因此，这也是对政绩观问题为什么是根本性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关于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错误政绩观就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以获得个人升迁和发展的资本。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用权为民，做到为政清廉；^{[32]19}要求领导干部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守公德就是要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32]26}

2. 树什么样的政绩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32]50}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人民利益立场，必然要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一贯的价值追求，矫正从个人

利益或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错误政绩观，必须要牢牢确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观念。新时代新征程，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放在首位，还要着眼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发展。要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共产党人的政绩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习近平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32]76}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为民造福的根本要求。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过程中，政绩观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不能以GDP增长论英雄，更要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领导干部的政绩观要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远和近的关系，正确政绩观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问题上。

3. 靠什么树政绩

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32]109} “广大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克服浮躁情绪，抛弃私心杂念，讲真话、报真数，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32]93} 他认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32]92} 并要求各级干部做到“三严三实”。^{[17]226} 党性修养要做到“三严”，严必须落于实之中，实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谋事要实。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

精神境界。习近平指出：“‘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有宽阔胸怀的建功立业思想，实际上就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32]87} 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要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要处理好显绩和潜绩等关系，更不能为出政绩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而应该着眼大局、着眼长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使思路、方案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

二是创业要实。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功成不必在我”与“功成必定有我”是辩证统一的，这是不求功成之誉而竭尽功成之力的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如果说“功成不必在我”反对的是为凸显个人政绩的乱作为，“功成必定有我”反对的是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责的不作为、假作为、慢作为。习近平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32]102} 他要求干部能“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32]97} 在新征程的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中，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开辟光明未来。

三是做人要实。就是要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狠抓落实，认为这是“衡量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32]93} 他反对花拳绣腿、光喊口号不行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他要求有钉钉子的精神，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32]93} 而且要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32]103} 在统揽大局的同时，操作中要细致精当，以绣

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力求实效。

4. 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机制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这正是共产党人政绩观深厚思想内涵的集中概括。立党为公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回答了树什么样的政绩，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回答了靠什么树政绩，实际上也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基本内容和主要方法。要使领导干部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党组织还必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机制。

要用好考核指挥棒。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关键体现在政绩观上，要贯彻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要用好考核指挥棒。“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让作风飘浮、哗众取宠的干部无以表功、受到贬责”，^{[32]123}纠正“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错误认识，^{[32]127}遏制“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恶性循环。^{[32]93}

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绩观错位必然导致形式主义，权力观扭曲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党内的顽瘴痼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本举措，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三严三实”；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又是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条件，各级党组织必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纠治政绩观偏差是全面从严治党抓“关键少数”的关键抓手，要

以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路径，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就是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管党治党要破除虚浮之风，“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32]138}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广大党员干部行使应有的权利、履行应尽的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好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不同历史境遇中不断凸显的权力观、事业观和发展观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全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包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准确把握了新的时代要求，把政绩观问题提到了根本性的高度，明确指出了政绩观错位是产生形式主义顽瘴痼疾的根本原因，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少数”的“关键问题”，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内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20.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周继强.红星照耀中国:学习党史参考资料,第1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66.
- [6]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
-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本社.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148.
-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8-459.
-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35.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8]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07.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23-524.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06.
-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3]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4]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5] 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0-101.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25.
- [27]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8]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9]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45.
- [30]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1]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 [3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

责任编辑:赵一同